

◎文学聚焦

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提升

本报记者 杨 鸥

作家格非的小说《隐身衣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最近获美国苏珊·桑格塔翻译奖。如今,中国作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获奖。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量也非常可观,比如《三体》英文版全球销售超过25万册,《解密》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销售均超过5万册,英文版进入美国亚马逊总销售排行榜前100名,西文版名列西班牙文学销售总榜第二。《人民文学》外文版推出了英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等9个语种版本,2016年一年出版各语种版本共计20期,得到了世界各国读者、专家的好评,其中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阿拉伯文版在埃及发行12000册。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关注,影响力越来越显著。文学界和其他有关方面作出积极努力,传播中国故事、中国声音,展现中国风貌,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的作品深化对中国的认识,增进对中国的了解,感受艺术魅力,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。

国外对中国文学作品需求越来越大

以前我们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作品,现在国外主动找我们买文学作品版权的越来越多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肖丽媛介绍,中国文学作品输出的地域扩大了,以前主要是亚洲,现在输出到欧美、拉美、阿拉伯国家,输出语种越来越多。今年4月22日的阿拉伯书展展出10本中国文学作品,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有4本,是国外主动提出翻译。铁凝的《永远有多远》泰文版发行了两万册。谈到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的原因,肖丽媛认为,随着中国国力增强,世界对中国越来越关注。而政府对于文学走出去的资助力度也越来越大,经典中国出版工程、丝路书香工程、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几大走出去工程的实施,加大了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海外推广力度。同时作家本人国际意识越来越强。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阿拉伯文版总监艾哈迈德·赛义德说,《人民文学》阿文版在埃及发行后,埃及整个国家都在谈中国文学,大家对莫言、迟子建、刘震云、吉狄马加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很感兴趣,他们向阿拉伯世界讲述中国故事。“我们只是提供给阿拉伯读者作品,让他们自己去了解。”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受到阿拉伯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和欢迎。我们向阿拉伯世界翻译出版了上千册中国图



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西语推广项目

书,其中包括中国文学作品。通过这些图书的翻译和介绍,阿拉伯读者开始意识到,世界上有一种模式叫中国道路,它和西方国家不一样,这很重要。”

“80后”作家张悦然说,意大利有两家出版社看到《人民文学》意大利文版上刊登的小说后找到她,如今她已经跟这两家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。《人民文学》外文版对外推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确实是有效的。

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就启动了“中国当代文学西语推广项目”,第一批推出30个中国作家。五洲传播出版社社长荆孝敏说,当时中国作家受拉美文学影响很大,而中国作家在拉美的影响与此不对等,这其中包括语言问题、文化差异问题。开始推出这个项目很难,当时中国与拉美文化交流还不多,缺乏相关渠道。中国作家也不感兴趣,麦家当时就表示,自己作品在国内有很大发行量,不愿走出去。对此,出版社做了艰苦的工作。如今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,与拉美交流越来越多,高层互访越来越多。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奖后,作家走出去积极性越来越高,影响力越来越大。麦家的《解密》《暗算》由西班牙最大的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。2013年出版的西语版《解密》,3万册都卖完

了。五洲传播出版社对外出版了32本当代作家作品,对外版权输出20多种,秘鲁甚至有这些作品的盗版。

荆孝敏说,随着中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央,国外对中国文学作品需求也越来越大,自己见证了这个过程。“1999年参加美国书展,我们送他们书他们都不要,现在他们花钱来买版权,需求大,热情也高。”

中国当代文学海外阅读取向发生变化

肖丽媛发现,与国外读者需求对路、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现状的作品更受欢迎。国外读者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,对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年轻人作品如“70后”作家作品更重视。

“中国文学的巨大体量、中国作家在时代变革中的复杂经验,能够产生出很多优秀作品。”科幻作家王晋康对中国文学充满信心:“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,刘慈欣的《三体》也获得了雨果奖,这充分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质量过硬。他们几位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孤峰,希望更多的作家作品能够走出去,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。”

作家鲁敏通过和版权代理方的交流发现,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阅读发生了需求上的变化,相较之前古代文学和描写中国乡村生活的作品而言,现在的读者更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当下中国城市和年轻人生活的描写。这反映了外国阅读市场对中国文学有一种类似于媒体的期待,希望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当下正在发生什么。她期望能看到另一种变化,即在兼顾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的同时,也能关注到中国作家在文学永恒主题和文学艺术本体上的不懈探寻。

多方共同努力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

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提升,得益于有关方面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,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。

在荆孝敏看来,文学作品输出要注意翻译的质量,翻译的文学性。五洲传播出版社的文学作品对外翻译采取中外合作方式,国内译者翻译,国外作家用文学语言校正。出版社每年都带中国的作家们到拉美讲学,国外也主动邀请麦家等中国作家去交流。“70后”作家的作品在国外受欢迎,“80后”“90后”作家逐步成长起来了,文学走出去越来越顺畅。“70后”“80后”作家出去,直接能用英语交流。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拉美推广项目第一期出了32本,还要再做到100多种,让国外对中国文学概貌有大致了解。阿拉伯地区和拉美多为发展中国家,与中国传统关系较好,中国发展模式对他们有较大吸引力。

据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李东华介绍,《人民文学》外文版每期以文学性主题形式策划选题,围绕主题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,同时兼顾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。在翻译方面,邀请外国母语译者翻译,适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。通过与国外出版社、高校、孔子学院的合作,进行推介,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。

肖丽媛表示,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展了与意大利、拉美、西班牙互译工程,以情感、饮食、动物等为主题,将葛亮、张楚、鲁敏、曹寇等作家作品译成西语作品,将冯唐、张楚、张悦然等作家作品译成意大利语。意大利方面主动邀请中国作家去交流。此外,人民文学出版社还通过数字出版、多媒体融合方式推介中国作家作品,制作以外国人视角采访中国作家的视频,覆盖前所未有。

◎作家谈

高酬利于养好稿

赵晏彪

去年底,一则《稿费涨啦,撸起袖子加油干吧》的消息不胫而走,令所有以写字为生的人翘首以盼。这预示着高稿酬时代即将到来。

2017年新年伊始,国内一些知名杂志《收获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十月》纷纷放出涨稿酬的消息,“群情鼎沸”,广受好评。

曾几何时,热爱写作的人有理想、有热情,能耐得住寂寞。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稿酬不高,但作品质量至今仍然值得称道。然而,时代不断发展,社会日新月异,现在的物价已非八九十年代可比,不知道涨了多少钱,作家的稿费一直没有涨。低稿酬标准运行了几十年,与社会严重脱节,稿费标准严重与物价上涨不匹配。所以,这也是一些杂志为何扎堆调整稿费的原因。

就纯文学刊物而言,与其他综合性刊物和艺术形式相比,稿费还是很低的。文学是一切体裁的母体,剧本也大多脱胎于小说,一部电影剧本比小说稿费高出10倍甚至百倍,实乃严重的倒挂现象,显然不合理。网络作品脱胎于文学母体,但网络文学又不同于纯文学。网络小说的收费模式已经成熟,靠写网络小说成为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的人很多,然而许多人从没出过纸质版的书。

提高稿酬不仅是时代的需要,也属于国家的文化战略。说到这次稿酬上涨,主要是靠财政“输血”。纯文学刊物的生存与发展,除刊物本身的功夫外,与社会文明程度、人民的文化素质、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娱乐化风行、金钱主义盛行的当下,提高全民阅读和写作能力,乃当务之急。

当然还有一种现象,即有的刊物名声在外,你就是不涨稿酬人家也会给你稿件,有的刊物你就是千字两千元好作家也未必给你稿件。究其原因,刊物的影响力、知名度和主编的创新意识、编辑们的亲和力都是因素之一。所以涨稿费是件好事,但好事要办好,刊物还要在质量上下功夫,要对得起国家的支持,对得起作家的辛苦,对得起读者的捧场和热情。尊重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础,办刊者应尊重职业道德,尊重作者的劳动,尊重读者的付出。

纯文学杂志的运行靠国家“输血”是暂时的,从长远计,应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,提高刊物的质量,提高编辑的素养。作为办刊人,我深知刊物要树立“读者为贵”的思想。一本刊物是否可以被众多读者认可,除了有名家稿件外,还要有杂志自身的品位、品质和品相,从封面设计到刊物规划、从内文的排版、新老作者的排兵布阵,到文章是否走心,是否直通人性;特别是主编办刊的格局,更是决定了刊物的格局,而刊物的格局也就决定了读者的喜欢程度。

如今移动互联网对纯文学和传统期刊冲击很大,年轻人的阅读习惯是手机上网阅读,这是一种快餐文化。就像是肯德基,刚开始很受欢迎,也让中国的传统餐饮业担惊受怕,但让你天天吃,也会厌烦的,所以下餐馆吃正餐是不二的选择。传统期刊如同饭馆,手机阅读和网络阅读就是快餐,有点影响但也有互补。

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高稿酬不仅是对作者劳动的最大认可,也有利于文学生态的发展,有助于文学事业的进步。高稿酬时代的到来,必将助推高质量文学时代的来临。

◎新作评介

少年心曲老相逢

——走进肖复兴《我们的老院》

陈玉成



肖复兴

当步入暮年的肖复兴站在老院的门外,落日的余晖照在老人的脸颊,院中老槐树的枝影透过院墙打在地上,浮生若梦却又宛如眼前。记忆里的京城早已换了另一番人间,曾经的故交此时也多半零落,回想起那段纯净透明却又易碎易逝的少年时光,作家的心底想必是苦涩的。人近黄昏,那些斑驳岁月里的故人故事,那些早已沉睡在心底的旧年心绪,再也遮掩不住,不断催促着他手中的笔,记录下这座《我们的老院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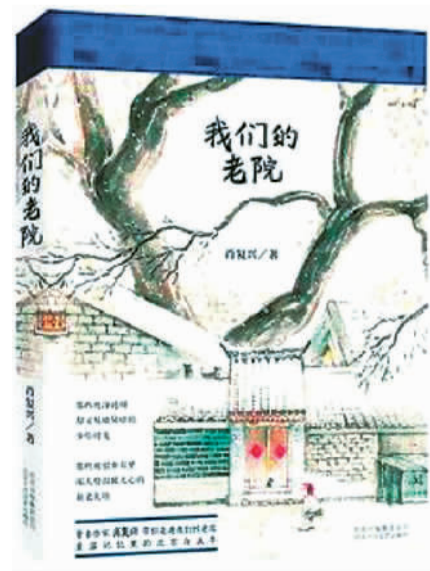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散文集,是作者继《蓝调城南》之后写下的又一部追忆老北京风物人情的作品,又一缕追忆似水年华的况味。不同于《蓝调城南》以蓝调笔触抒写城南的会馆、故居、戏园、庙宇等旧时物事,《我们的老院》是一部描摹老北京人事更迭人心嬗变的“人”之卷。肖复兴的北京,是温暖而鲜活、忧郁而迷离的,极少文人式的精巧的雕琢。在书中,他以不事雕琢的朴素之色,讲述着“我”童年时代的无忧无虑与少年时代的阵痛与迷茫,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发生在老院里的快乐与忧伤。同时,更以“我”的成长经历为主线,将这处现实地理空间中数十位人物的生活故事,如织锦般来回织补,从而使读者得以在这支微型的锦缎中,窥见一个时代普通北京市民的生存色调。

自1947年出生至1968年前往北大荒插队,“我”在这座老院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21年时光。少年人的心底最是纯粹、最少羁绊的,自然也最令人们在怀旧之时难以忘怀。“我”们可以在中秋节之前猴子似地爬上枣树疯玩疯闹,再遵守老人们留下的规矩,端着脸盆给各家各户平均分配“战利品”,即使对落魄之人也毫不避讳,无需理会自家大人的世故心思(《三棵老枣树》);也曾为品尝一下无花果的滋味,夜半之时潜入隔壁老人们的屋里偷嘴,而不惧回到家中的一顿好打(《无花果》)。《我们的老院》中的旧时光总是温情脉脉的,带着几分对逝去烟云的回望与依恋。作者娓娓道来的老故事是人间烟火气十足的,那些发生在其间的悲欢离合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际限,如同你我父辈的往事一般可亲可敬。尽管这个时代物质匮乏,但人们始终恪守着中国最传统的为人信条与社会道德,愈是艰难愈能相濡以沫。“我”们则能在大人的羽翼庇护下,度过人生最纯真的一段时光。

可这种平静的生活,终被定格在作者19岁这一年的记忆里。这一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,无情地撕开了人们心头的那道口子,将曾经暗藏人们心底鲜为人知的神秘往事暴露于日光之下。《鼻烟壶》里的老孙头只因留洋归来便被视作美国特务,连装鼻烟的奶粉盒子都被视作潜藏炸药的作案凶器;《罗宋帽》里的老梁只因开过一家小绸布店,置办过一间小四合院,便被视作“牛鬼蛇神”扫地出门遣返回乡……

如今,这段非常岁月里的其人其事

已经了无痕迹,作者却要在被掩埋的历史中,打捞属于老院的一段集体记忆。一个人的悲欢也许很难引起普遍的共鸣,但当着一群人的命运连在一起,便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一种缩影,是任何人都无法删改的公共记忆。因此,作者用笔写下了这样一部特定年代普通



《我们的老院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天有二日?》解读禅让时期大清朝政



清史专家卜键《天有二日? 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》一书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从乾隆六十年开始,在5年的时间跨度中描摹宦情、勾勒人物,军国大事、两朝帝王以及许多朝廷大臣涵括其中,而着力点仍在禅让的3年。乾隆皇帝为何以85岁高龄实行了大清王朝唯一一次“禅让”?这次禅让对清王朝乃至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何影响?我们耳熟能详的皇帝和臣子们,在这段历史时期又有着怎样的作为和博弈……作者经过多年研究和爬梳考据的这部心血力作以准确明晰的史实、深入浅出又风趣的语言,再现了这段特殊的清王朝历史的真相。

在日前举办的研讨会上,作家王蒙认为,这部作品是文学的史学、史学的文学,对历史人物的描写达到了活灵活现的体贴的程度,人物、事件真实可信,比一般的历史著作更充实、更丰满、更生动、更有趣味,具有推敲、分析、总结的价值,对史学的叙述、对文学的历史题材选择有创造性,态度郑重又具有文学价值。(文一)